

苦辣甜

中国著名民族资本家的路

● 吴广义 范新宇



写在前面的话

我们俩，一个是学习历史科学的，一个是学习经济科学的。

我国著名民族资本家创办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历程，是我们时常谈论的话题。近年来，介绍欧美、日本著名企业家创业之路的书籍在我国陆续出版，而反映我国著名民族资本家创业之路的书籍倒不多见。我们认为：借鉴前者固然是有益的，而借鉴后者更是必要的、可行的。

为了探讨前人走过的路，并把其中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本书从众多的民族资本家中选出三十九位工商业杰出人物，详细介绍了他们走过的坎坷道路。这些著名民族资本家堪称我国机器工业和新式商业的开拓者，也是学习欧美、日本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法的先行者。他们抱着“实业救国”的宗旨，在“一少资金，二缺技术，三乏人才”等困难情况下艰苦创业。企业初创时，遇到了外国厂商的排挤和打击；企业稍有发展，又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遭到了日伪的“军管”和摧残；好不容易盼到了抗战胜利，企业却面临着国民党官僚的巧取豪夺和敲榨勒索，濒于绝境，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企业才获得新生。纵观横览，用“苦”、“辣”、“酸”、“甜”来形容我国民族资本家走过的道路，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本书力求全面真实地记叙这些历史人物及其所处的历史环

责任编辑：罗溟

封面设计：蒋明

插图：蒋明

苦辣酸甜

中国著名民族资本家的路

Ku La Suan Tian

Zhongguo Zhuming Minzu Zibenjiadelu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10 2/15 • 插页 2

字数：230,000

1988 年 2 月第 1 版 198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745

统一书号：11093 • 272

定价：2.65 元

ISBN 7-207-00246-7/K • 22

境，既写出他们为追求国家富强而反帝反封建的一面，也写出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多有联系和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的一面，展示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工商业的特点及其发生、发展的脉络，以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

这些著名民族资本家在工商企业的经营决策、生产管理、产品销售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书中在这方面用了较多的笔墨，这对于今天为建设四化而奋斗的人们将有所裨益。民族资本家的资本积累过程，就是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过程，本书所收的人物也不例外。他们对工人的剥削方式大体相同，故只对其中有典型意义者加以交待，余者从略。

为这些著名民族资本家立传，搜集资料可以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他们生活在动乱的年代，留下的有关资料零散难觅。为了把一部史料翔实的书献给读者，我们与北京的一些图书馆、资料室结下了不解之缘，还多方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近代史、经济史、文史资料、工商联等部门的友人取得联系，查找资料，订正史实。同时，我们对某些民族资本家的后人及其创办的企业进行了调查访问，从而弥补了文字资料的不足。我们搜集到一部分著名民族资本家的图像，置于篇头，没有搜集到者只好暂付阙如。

书中的《民族百货业先驱黄焕南》和《蔡昌创办上海大新公司》两篇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汪仁泽同志执笔。本书脱稿后，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严如平同志审阅，谨表示衷心感谢！

吴广义 范新宇

1987年5月于北京

B22263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从状元到实业家的张謇	1
张弼士创办张裕酿酒公司	14
简氏兄弟智斗英美烟商	22
民族百货业先驱黄焕南	32
航运业大亨卢作孚	40
“工业先导”范旭东	52
北方企业界英才李烛尘	65
丝织风景画创造者都锦生	71
面粉大王荣氏兄弟	78
纺织工业俊杰刘国钧	88
百货业巨擘郭乐	97
体育用品工业巨子孙润生	117
锐意进取的化学工业家方液仙	124
机器工业巨头严氏父子	134
余芝卿、薛福基经营大中华 橡胶厂	143
从学徒到经理的沈九成、 陈万运	150
味精大王吴蕴初	159

1

造纸工业英髦竺梅先、金 润庠	171
提倡国货的商业家李康年	179
周子柏与“金星”金笔	186
火柴大王刘鸿生	194
“竞争中求发展”的电器工 业家胡西园	207
洗冠生创办冠生园	216
西药业翹楚项松茂	229
从穷货郎到商业巨子的武百祥	237
梁墨缘兴办内河航运	250
杰出的出版家张元济	256
白手起家办工厂的滕虎忱	272
毛纺织工业巨擘宋棐卿	280
外贸业俊髦朱继圣、凌其峻	292
丝织工业魁首蔡声白	303
蔡昌创办上海大新公司	311

从状元到实业家的张謇



在封建社会里，只要一考中状元，就意味着宦运亨通，前程是高官厚禄。然而，清朝末年却出了这样一个状元，他不去当官，而跑去办工厂，当实业家，当时被朝野上下视为“怪人”，这个“怪人”就是张謇。

“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

张謇是江苏通州（今南通）人，清咸丰三年（1853年）生于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他的父亲粗通文墨，尽力使他受到良好教育，以博取功名。他四岁时，即由父亲授《千字文》，很快能背诵得一字不差，父亲的影响和封建思想的熏陶，使张謇从小就热衷于功名，向往读书做官的道路。他刻苦攻

读，15岁时就把《尔雅》、《仪礼》、《礼记》、《左传》等经书读完，能做八韵体，并制艺成篇，16岁时考中秀才，但因家道中辍，从此长期做大官的幕宾。直到30岁出头，才重操科举旧业，赴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以第二名中举。由于他是南方人在“北榜”名次最先者，按习惯被称作“南元”，名声渐著，并且成为南派“清流”官僚翁同和等着意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均不中，遂心灰意懒。他回顾自己的科场生涯，25年中经过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20余次，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有120天之多，结果无非是听凭考官“喜怒而寒燠之”。失意之余，他把自己多年常用的一套考具也扔掉了。

张謇在应考的这些年里，还先后主持了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洲书院，并在通州、海门地区办理花（棉）布减捐，倡导改良和发展蚕桑，主张改良农业，提倡采用机器，并集资兴办公司。通过这些活动，他与当地花布商、典商、木商、烟商、纸商、洋药商和一些中小地主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人，以后成为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主要支持者。

光绪二十年（1894年），恰逢清朝慈禧六十寿辰，特地举行了一次“恩科会试”。这一年的春天，张謇迫于父命再次进京应试。他本来毫无信心，不料得到翁同和的大力推荐，高中状元，循例授翰林院修撰。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帝后两党矛盾激化。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派拥戴光绪皇帝，好发主战议论，抨击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借以冲击后党，想为徒有“亲政”虚名的皇帝争取一些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帝党中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正当主战、主和两派激烈争论之际，张謇因父丧而回籍守制。

甲午战争以清朝耻辱地割地赔款而告终，中国面临着被瓜分

亡国的巨大灾难，爱国救亡和维新变法的浪潮蓬勃兴起，要求独立发展民族工业的呼声也日益强烈。《马关条约》准许外国资本在中国内地设厂，使张謇产生深沉的危机感。他在替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强调指出：“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机器厂、制造土货、设立行栈，此小民一线生机，历年总署及各省疆臣所力争勿予者。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沾。……今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他意识到外国资本侵入比商品倾销更为可怕，因此主张尽快讲求商务、工艺，各省建立商务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设局、建立公司，抵制外国设厂和洋货倾销。民族危机的刺激，中外资本主义的影响，使这个已经踏上士大夫之路的人，把注意力转向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出了“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

在民族工业和民族商业的关系上，张謇认为应该把工业放在首位。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徙之利。”要发展民族工业，就必须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张謇主张：“应请各省广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字之学，博延外洋各师教习。三年小成，乃择其才识较优者，遣令出洋肄业。”他还进一步指出了教育与实业的关系，认为：“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从而指出了“实业与教育要并进迭用”的思想。

此时的张謇已经摆脱了封建士大夫的窠臼，开始踏上创办实业的艰难历程。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自前清甲午中国师徒败衄，乙未马关订约，国威丧削，有识蒙垢，乃知普及教育之不

可已。普及有本，本在师范，乃知师范之设之不可已。设师范之资，其数非细，他国师范，义由国家或地方建设而扶助之。当是时，科举未停，民智未启，国家有文告而已，不予谋也。地方各保存固有公款之用而已，不肯顾也。推原理端，乃不得不营实业。然饒一介穷儒，空弩蹶张，于何取济？南通固有名产棉最旺之区也，会有议兴纺厂于通而谋及者，乃身任焉。”于是，清朝末年出现了“状元办厂”的奇迹。

“时时恃可成之心，时时作可败之计”

张謇有兴办实业和教育的愿望，而历史也偏偏在这时候为他创造了契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底，总理衙门奏请谕令各省设立商务局，以“维护华商，渐收利权”。紧接着，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奏派张謇在通州设立商务局。张謇乘此良机办起了大生纱厂。

通州位于长江口北岸，离上海不过三百里航程。东北滨海，南面临江，土壤、温度、雨量、霜期都很适宜种植棉花。这里的棉花产量高，质地洁白，富于弹性，素以“沙花”著称。本地手工棉纺织业也很发达，“通州大布”历来畅销于东北市场上，而且对机纱的需求量也日益增长，这些条件都很有利于张謇创办纱厂。创办大生纱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张謇说：“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须。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得，我民日贫，国于何赖！”可见他是想制止日本厂家掠夺我国的廉价原料，创办民族纺织厂以抵制洋货的倾销。

要创办大型纱厂，仅仅是“原料有来源，产品有销路”还远远不够的。何况当时，南通地区不仅没有一家机器工厂，就连小手工作坊也为数不多，与长江南岸的一些城市相比是相当落后。这

意味着张謇需要披荆斩棘地开拓新路。

大生纱厂最初定为“官招商办”。张謇经过两个多月的“招商”活动，邀集了本地花布商沈燮均、陈维镛、刘桂馨，上海绅商郭勋、樊芬、潘华茂等六人认办，这便是大生纱厂初期的所谓“通沪六董”。他们协商决定，在通州城北唐家闸一带水陆方便处建厂。《易经》上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便将纱厂定名为“大生”，还撰了一副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概括了纺织工业关联着国计民生的重要性，表达了自己创办纺织工业的雄心壮志。大生纱厂预计招股 60 万两，上海方面招集 40 万两，通海（通州和海门）方面招集 20 万两。通海方面的三位董事比较积极，很快就买下地皮，“规划垫基、浚港、筑岸、建造行栈及监工住宅”；而沪董方面却一直是迟疑观望，招股工作没有开展起来。接着樊芬和陈维镛打了退堂鼓，辞去董事职务。于是张謇只好推荐本地木商高清、典当商蒋锡绅为董事，仍合“六董”之数。但通海地区毕竟财力微薄，一些有钱人不相信一个穷书生能办大工厂，不肯出钱入股，加之当时“通州本地风气未开，见闻固陋，入股者仅畸零少数”。张謇没有办法，只好向官府请求援助。

恰巧，上海商务局要贱价出卖一批“官机”。这些“官机”原是湖北南纱局向外国洋行定购的 4 万枚纱锭的纺织机，货到上海以后，南纱局又不要了，这些机器已在杨树浦江边堆放了 3 年。张謇得知此事后，与上海商务局达成协议，把“官机”折价 50 万两作为大生纱厂的股金，另招商股 50 万两，大生纱厂改为官商合办。这样一来，纱厂的机器有了着落，可商人们对官府办厂缺乏信任感，50 万两商股根本无法募集。无奈张謇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求援，张之洞向两江总督刘坤一通融，将“官机”对半平分，由张謇和盛宣怀在通、沪分办两个厂；大生纱厂因此可以少筹股金 25 万两，同时把官商合办改为“绅领商办”，有利于向民间商人招集股金。

尽管如此，实际筹集到手的资金仍很有限。两位沪董潘华茂和郭勋也辞职不干了，集资重担全落在张謇身上。建厂伊始，建造厂基需要雇用许多职员、工役，加上材料、运费等各项费用，很快使张謇手头的6万多两现金花得一干二净。于是他只好奔走于南京、湖北、上海、南通等地央亲求友，筹集一些资金以解燃眉之急，使建厂工程才没有中途夭折。当“官机”运到时，张謇一见又叫苦不迭，原来这批机器堆放了3年，“上雨旁风，板腐厢裂，机件断烂者十之三四”。张謇不得不又四处筹集款项，“续渐添配凑补”。

就在张謇办厂进退维谷之际，有人讥讽他弃官从商，无非是“好利得征”，为赚几个臭钱；有人惋惜他“以矜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有人则等着他“出洋相”，“闹笑话”。舆论的压力，象一张无形的网，企图束缚张謇的手脚。张謇不为所动，坚持将机器全部安装完毕。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1899年5月28日），张謇先举行祭礼，然后试机，一切运转正常。试机以后，还有流言蜚语，说什么“引擎虽动，何时出纱”？四月十四日（5月23日），历尽磨难的大生纱厂经过张謇的苦心奋斗终于正式开车投产。

大生纱厂投产以后，困难接踵而来。开工以后需要棉花日多，资金周转不灵，张謇向官府求援，结果是碰壁而归；请求另派殷富绅商接办，又未得到许可；想把纱厂暂租给上海巨商，也因对方条件太苛刻而未能达成协议。走投无路之时，张謇只好“定计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纺纱，则停车而闭厂，以还股东”，刚刚开车投产就准备闭厂，可见张謇的处境是多么艰难。幸好这年夏秋之间的棉纱行市一直看涨，机纱在通海地区十分畅销，卖纱所得现款日益增多，原料供应得以不缺；加上股东沈燮均把自己的同兴宏布庄的资金全部接济了大生纱厂，才使大

生纱厂总算站稳了脚跟。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张謇终于建成了我国时间较早、规模较大的机器纺织厂。

大生纱厂创办成功，地方官绅纷纷前来祝贺。在庆祝会上，两江总督刘坤一询问张謇办厂成功的秘诀，张謇回答说：“没有秘诀，无非是时时恃可成之心，时时作可败之计。”张謇就是这样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走过来了，成为南通近代工业的开路先锋。

“苟欲兴工，必先兴学”

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科学技术和专业技术人员，张謇曾用重金聘请外国技师和技工，专门给他们盖起了洋楼，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可是他们多方勒索，盛气凌人，每月到厂只有三、四天，还拿技术卡人。这些现实使张謇认识到，必须培养出自己的技术人才，而要培养人才必须从教育入手，“苟欲兴工，必先兴学”，“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謇写成《变法平议》，劝说刘坤一兴办新式学校。1902年他应刘坤一之约，为刘坤一拟定《学制奏略》和“兴学次第”，建议首先兴办师范学校，一年后各州县分别设立高等、寻常小学校，三年后各府设立中等学校，五年后各省设高等专科学校，京师设大学校。刘坤一此时暮气已深，没有率先兴办新学的决心，其周围的守旧官吏也不以为然。张謇大失所望，回到通州自行创办了师范学校。

张謇选定通州城东南已经荒废了的千佛寺作为校址，修建校舍，共占地41亩，于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一日（1903年4月27日）正式举行通州师范学校开学典礼。张謇对于学习年限，课程设置，学生的住宿、伙食，都一一亲自过问。开始招生仅限于附近各县，以后扩展到江苏全省及其周围的省区，学生由几十人增加到五百人。学科的设置逐渐增加，陆续开设了农、工、蚕桑、土木、测绘等

科。这是我国第一所新式师范学堂。接着又办了一批幼稚园、小学、中学和职业学校。职业学校中以纺织、农业和医校较为有名，后来三校扩充为专科，进而合并为南通大学。他办专业学校时，先附设于师范学校，逐渐发展成专科，创出了一条由小到大兴办教育的路子。张謇创办或资助的学校还有吴淞商船学校、吴淞中国公学、复旦学院、龙门师范、扬州两淮两等小学、中学及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和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直到1952年前，全国唯一的纺织本科——南通大学纺织科向全国输送了大量纺织工程技术人员，至今上海、天津、常州、东北等地纺织界的很多业务骨干都是该校培养出来的。河海工程学校为中国提供了早期的水利工程技术人才。他办的普通教育，也为后来高等专业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现在中国科学院中的学部委员，已知的就有六人是从南通出来的，青年数学家杨乐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国最早的博物馆就是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到日本考察实业和教育，参观了日本的博览会和博物馆，受到很大启发，回来以后便倡议创办博物馆。他认为博物馆能辅助学校教育，“盖有图书馆、博物苑，以为学校之后盾，使承学之彦有所参考，有所实验，得以综合古今，搜讨而研论之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隔河相对的一片荒地上动工兴建博物苑，并自任博物苑总理。

首先建成的是测候室，即气象观测站。测候室是一座二层建筑，楼顶是露天方台，设风向、雨量、温度等测试仪器，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日（1909年1月1日开始观测气候，在报上刊登天气预报。接着又建造了南馆和北馆。南馆称博物楼，楼上是历史部和美术部，半圆形的阳台两边是张謇手书的楹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花木之名。”历史部中陈列了金、玉石、陶瓷、拓本、乐器、军器、刑具等展品，美术部中陈列了书画、雕

刻、漆塑、织绣、编物、文具等展品。张謇把自己家中的文物都交给博物馆收藏，以供大家观赏。楼下是天产部，收藏了丰富的自然品物，包括世界各地珍贵的动植物标本，以及矿石、土壤标本。北馆也是两层楼房，楼上陈列清代南通画家钱恕画的长达10多米的《江山雪景图》，楼下陈列在东海边出土的长达十多米的鲸骨骼。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博物苑藏品达到3605号，价值不下50余万元。

博物苑内除用于陈列的建筑物外，还建造了假山、荷池、亭榭，栽种了各种名贵花木和中草药，饲养了白鹤、孔雀等禽鸟和虎、豹等动物。可见南通博物苑是一座独具特色的博物馆，所以张謇将其命名为“博物苑”，并亲自题写了“博物苑”的石额。

张謇把南通博物苑看成是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补充，所以将它附属于通州师范学校。学生们在课余闲暇经常漫步于近在咫尺、兼有园林之胜的博物苑中，视野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扩。

张謇创办的专科学校中，还有一所专门培养刺绣人才的“女红传习所”，聘请刺绣大师沈寿担任传习所主任兼教习，培养了15期学生。沈寿把西洋美术的技艺独创地融汇到刺绣中去，发展了中国的刺绣技艺。推出了独具特色的南通刺绣，并一直在南通流传下来。现在在一些大宾馆里常可看到南通美术工艺研究所制作的大幅人物绣、锦绣。沈寿曾口授18种刺绣基本针法，由张謇记录并整理成书，这就是我国刺绣理论著作《雪宦绣谱》。

由于时代的局限，张謇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他既主张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又主张学习旧的传统伦理道德；他主张对学生严加管束，即采取“干涉主义”；他反对自由、平等的学说。尽管如此，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还是奠定了通海地区近代教育的基础，促进了当地近代工业的发展。

“造福于一方，影响于全国”

大生纱厂建成以后，张謇充分利用本地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原料，节省了长途运费，因此在竞争中能够处于优势地位，加上不断改进经营管理，利润逐年增长。张謇薄高官厚禄而不为，专心致力地方实业，而且卓有成就，受到时人的赞许。当时上海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时报馆总经理狄楚青都出其门下，在报上经常替他宣传，称他为实业大王、山中宰相，因此张謇的声誉日隆，一遇国家有事，通电必有张謇署名，一遇实业界有事，必请南通领衔。张謇为了增加流动资金，在大生纱厂办理存款业务，人们纷至沓来，存不进款的还央亲托友。张謇要扩大生产规模，续招新股，一呼百应，股份立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謇在崇明久隆镇（今启东县）创办了大生二厂。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不断高涨，“提倡国货、抵制洋货”的呼声此伏彼起，国产棉纱销路大增，给大生纱厂带来无限的生机，到1913年的14年间，大生纱厂共获净利540万两，发展成为拥有资本200万两和纱锭67000枚的大厂，是“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唯一成功的厂。”

为了解决大生纱厂的原料，张謇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始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开垦苏北沿海大片荒滩，大面积播种棉麦。海滩都是盐碱地，先要蓄淡，继要种青，逐渐减杀碱力，还要筑堤拦阻海潮，方可种植棉麦。那时没有公路，张謇来往垦地，坐一辆独轮小车，顶风雨，冒寒暑，规划水利，招徕佃农，费了10年之力，垦牧公司的海复镇才成为一个重要镇市，斥卤瘠土才变成膏腴良田。由于通海垦牧公司树立了榜样，其他垦牧公司闻风而起，开辟了千里草莱之地。

除了通海垦牧公司做为大生纱厂的原料基地外，张謇还创办

了广生油厂，利用大生纱厂轧花的棉籽榨油自用；创办了大隆皂厂，利用广生油厂的“下脚”制造皂烛；创办了大兴面厂，利用大生纱厂的剩余动力磨粉，供纱厂浆纱和工人食用；创办了资生铁厂，专为大生纱厂修配机件；创办了大中通运公司、大达轮步公司等，主要为大生纱厂解决运输问题；创办了懋生房地产公司，为大生等厂职工建造宿舍。这些企业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大生纱厂服务，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大生资本集团。

张謇不仅办了许多配套企业，而且对通州城市做了合理的布局。他把火电厂建在天生港，大生纱厂、资生铁厂、广生油厂建在城郊西北便于航运的天生港唐家闸。当时，一是考虑到交通运输，二是考虑到从农村吸收劳动力。这在客观上避免了日后的城市环境污染，又发展了南通城外的两个工业区，形成了现在南通市区一城三镇的格局。

张謇还在通州创办了图书馆、气象台、剧场、公园、医院、盲哑学校、伶工学校等社会文化福利设施，促进了通州地区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对全国也产生重大影响。所以胡适评价张謇的所作所为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造福于一方，影响于全国”。

“野老洒泪江风前”

随着通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张謇在东南以至全国的声望日益增高。同时，他从一个忠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逐步转变成成为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实业家。

1911年，张謇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1913年，他再度出任北京政府农商部总长，社会地位和声望迅速提高，为大生纱厂的发展带来了有利的条件，金融界纷纷争先为他提供贷款，地方官吏也不敢来找大生纱厂和通海垦区的麻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欧美列强对中国的棉纱倾销大大减少，民族